

明清 丝路贸易与

对外开放



赵崔莉
／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明清丝 路贸易与 对外开放

赵崔莉
／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赵圣涛

封面设计：林芝玉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丝路贸易与对外开放 / 赵崔莉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8

ISBN 978-7-01-016488-5

I. ①明… II. ①赵… III. ①对外贸易—贸易史—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① F75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67374 号

明清丝路贸易与对外开放

MINGQING SILU MAOYI YU DUIWAI KAIFANG

赵崔莉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23

字数：370 千字 印数：0,001—4,000 册

ISBN 978-7-01-016488-5 定价：8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赵崔莉博士的《明清丝路贸易与对外开放》的鸿篇大作即将出版，正逢“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周年之际。三年来，“一带一路”已经实现从愿景到行动，从蓝图变现实，学术界的研究也基本完成顶层设计的探讨，进入以风险和挑战为主的研究新阶段。对于古代丝绸之路，曾有“源于秦汉，盛于唐宋，变于明清”之说。赵崔莉博士正是选择了丝绸之路“变于明清”这一特殊阶段而展开研究的，这一视角的研究对当今推进“一带一路”的风险与挑战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不言自明。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无论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均与中国的对外开放和中国的崛起形影相随。“一带一路”无疑是一个跨越时空的构想，从历史深处走来，甚至早于张骞“凿空西域”，至少可以追踪到“蜀身毒道”的开通。就“丝绸之路”一词而言，无疑是一个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历史符号，同时也是沿线各国和地区数千年来不断交往的历史见证。即使“丝绸之路”一词，也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首次提出的概念。2014年，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丝绸之路的东段：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文化遗产，成为首例跨国合作、成功申遗的项目。“一带一路”融通古今、连接中外，承载着丝绸之路沿途各国发展繁荣的梦想，赋予古老丝绸之路以崭新的时代内涵。

“丝绸之路”见证了古代中华文明的辉煌，但并没有引领中华帝国融入近代化潮流。世界近代化潮流兴起之时，正是我国明清封建社会大变革的重要历史时期。明朝有过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也颁布过禁海令，允许朝贡贸易，而对私人海外贸易一律禁止。满清王朝为了打击反清复明的活动，不仅继续实施禁海令，而且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但是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都不可能做到绝对的闭关锁国，明清两个朝代均出现过禁海与开海，反反复复。这些反复折射出

封建统治者面对近代化潮流的无奈。

“一带一路”是一个涉及经济贸易、政治外交、人文交流等诸多领域的复合型国家战略，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为核心，其中贸易畅通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也是对外开放的重要体现。根据我的理解，赵崔莉博士《明清丝路贸易与对外开放》的鸿篇大作从三个方面对我们研究“一带一路”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其一，论著全面梳理了古丝绸之路“变于明清”的发展脉络，坚持以史为据，论从史出，从而提炼出一系列观点性结论。资料收集并合理运用，是做学问的基础，对研究历史问题尤其重要。论著以翔实的资料对明清时期的丝路贸易进行了极具逻辑性的梳理，又以恰当的资料深入研究了朝贡贸易（包括朝贡贸易的鼎盛：郑和下西洋），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明清时期中国对东北亚的日本、东南亚诸国、欧美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俄罗斯及美洲等国家和地区贸易往来的基本情况。作者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分工理论、国际价值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来分析明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史实和对外贸易政策，并由此引出这一时期货币从贱金属铜钱向贵金属白银转换特别是白银货币化对全球化的推动，很好地诠释了古代丝绸之路“变于明清”时代趋势。

其二，论著辩证地厘清了明清丝路国内外的相互关系，重新定义了明清中国的对外开放相关问题。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明朝颁布禁海令，不许民间造大船，片板不得入海，基本禁绝了海外贸易，清朝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继续推行闭关政策，构筑了隔绝中外的一道堤墙，致使一个开放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完全封闭的中国。作者认为这种观点不符合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实际。自秦汉直至鸦片战争两千多年的漫长时期，只在明代中期以及清代初期有数度的禁海，但也只是部分的禁海，且时而禁海，时而开海，而且明清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空间范围大大扩大，除东亚和东南亚外，明清与中亚、西亚、欧洲甚至非洲都已经有了比较频繁的商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往来。

其三，论著认为研究丝绸之路的关键是把握好主动开放和被动开放的抉择问题，为“一带一路”的推进提供有价值的历史参考。作者认为明清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开拓了四条渠道，即以民间贸易的丝绸之路渠道、官方派遣使节和留学生渠道、佛教徒和传教士渠道、战争渠道。这一时期，几乎所有亚洲、欧

洲、美洲的主要国家都与中国有了直接贸易关系。作者认为，明清丝路贸易和对外开放始终是与世界历史的近代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有力地促进了欧洲与中国的社会变革。但明清时期的对外开放属于被动的对外开放，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才是符合时代发展的对外开放。正如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我国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一带一路”倡议正是适应全球化发展趋势、中国周边环境的新变化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而独立自主地作出的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抉择。

赵崔莉博士多年来一直潜心研究明清社会史及明清对外开放问题，著述丰厚，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她的合著曾荣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我作为研究“一带一路”的学者，十分欣喜地看到赵崔莉博士的《明清丝路贸易与对外开放》一书出版，这将为推进“一带一路”的深入研究提供重要学术支撑。我作为赵崔莉博士的同事，与赵崔莉博士有过多次合作研究的经历，平日交流甚多。此篇文字实际上是我与赵崔莉博士的又一次深入交流，也就以此作为她这部鸿篇大作的序言。

王志民

2016年7月25日

目 录

序.....	001
绪 论.....	001

上 编

明代丝路贸易与对外开放

第一章 明代丝路贸易的国内环境.....	017
第一节 明代丝路贸易政策形成的国内环境.....	017
第二节 政策与制度：明代丝路贸易与对外开放.....	022
第二章 明代丝路贸易范围与开放格局.....	065
第一节 明代海上丝绸之路.....	066
第二节 明代陆上丝绸之路.....	090
第三章 明代丝路贸易的商品类型.....	093
第一节 输入输出的手工业产品和农产品.....	093
第二节 劳务输出：海外华侨的形成——万历后期华人下南洋.....	095
第四章 明代丝路贸易和对外开放成就.....	099
第一节 明代海上丝绸之路与城市分布.....	099
第二节 白银的大量流入.....	105
第五章 明代对外开放的社会影响.....	121

下 编

清代丝路贸易与对外开放

第六章 社会环境与政策：清代丝路的发展	131
第一节 清代丝路贸易政策形成的国内环境	132
第二节 清代“对外开放”与“闭关锁国”政策的历史演变	138
第七章 清代丝路贸易范围和开放格局	187
第一节 清代海上贸易	187
第二节 清代陆上贸易	211
第八章 清代丝路贸易商品类型	231
第一节 中国商品输出及其对西方国家的影响	231
第二节 鸦片的输入对清代社会的影响	234
第三节 对外劳务输出——华侨的发展	251
第九章 清代海上丝路贸易管理机构：海关和广州十三行	257
第一节 清代海关管理海外贸易	258
第二节 清代广州十三行垄断海外贸易的原因及其效果	272
第十章 清代对外开放及其社会影响	287
第一节 东南沿海港口的发展	287
第二节 商帮崛起及其对外贸易	297
第三节 美洲粮食作物传入中国	326
结 论	339
参考文献	345
后 记	359

绪 论

一、选题缘起

（一）开放型经济发展

我国的开放型经济发展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以及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而逐渐发展壮大起来。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将对外开放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以来，在党中央正确的对外开放战略思想指导下，我国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开放型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中国要“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①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但是，中国走向开放的历史进程却曲曲折折，布满荆棘。在千年的发展史上，中国从历史上的相对开放到近代的闭关锁国，再到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国门，经过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全面封锁，“文化大革命”之后经过对外开放的酝酿和起步，党中央最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形成对外开放的大政方针。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如何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全面提升开放型

^① 李安方：《新阶段·新模式·新格局：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面临的重要任务。这是我们新时期开放型经济的战略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也充分彰显了我国实施更加积极主动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坚定决心和信心。当前，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对开放型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因此，要认真思考历史上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一些关键性、方向性和战略性问题，总结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为进一步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从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献计献策。

（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

当今世界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酝酿深刻调整，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发表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了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明确提出，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它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边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一带一路”的建设不仅不会与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东盟（10+1）等既有合作机制产生重叠或竞争，还会为这些机制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

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共建“一带一路”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发展。“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项目将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发掘区域内市场的潜力，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生活。

当前，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高度关联。中国将一以贯之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中国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责任和义务，为人类和平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古代就诞生出闻名遐迩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两汉时期中国人开创的以洛阳、长安为起点，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陆上贸易和文化交流通道，同时也开创了亚欧大陆经济整合战略。西汉时期，张骞（约公元前164—前114年）于公元前138—前126年从长安（今陕西西安）出发，联络大月氏人，共同夹击匈奴。首次开拓丝绸之路，被称为“凿空之旅”。古罗马人征服叙利亚的塞琉西帝国和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后，通过安息帝国、贵霜帝国和阿克苏姆帝国取得从丝绸之路上传来的中国丝绸。西汉末年，丝绸之路一度断绝。东汉时期，班超从洛阳出发，再次出使西域，他到达了西域，他的随从到达了古罗马。这是东西方文明的第一次对话。同样也是在东汉，印度僧人沿着丝绸之路到达洛阳，将佛教传入中国，从另一个角度拓展了丝绸之路。唐代，洛阳人玄奘沿着丝绸之路历时19年到印度求取真经，促进了中华

文明与印度文明的交流，写下了《大唐西域记》。

丝绸之路是起始于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陆上商业贸易路线。从运输方式上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它最初的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瓷器等商品。德国地理学家 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 最早在 19 世纪 70 年代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是指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交往的海上通道。2000 多年前，一条以中国徐闻港、合浦港等港口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成就了世界性的贸易网络。

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东南沿海，经过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并推动了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在宋元时期，中国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大幅提升以及指南针的航海运用，全面提升了商船远航能力。这一时期，中国同世界 60 多个国家有着直接的“海上丝路”商贸往来，引发了西方世界一窥东方文明的大航海时代的热潮。

中国境内海上丝绸之路主要由广州、泉州、宁波三个主港和其他支线港组成。从 3 世纪 30 年代起，广州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唐宋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明初、清初海禁，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是世界海上交通史上唯一的 2000 多年长盛不衰的大港；宋末至元代，泉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并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后因明清海禁而衰落，泉州是唯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承认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在东汉初年，宁波地区已与日本有交往，到了唐朝，成为中国的大港之一，两宋时，靠北的外贸港先后为辽、金所占，或受战事影响，外贸大量转移到宁波。

明清时期是中国具有三个划时代意义的开端：一是中国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二是与世界融为一体的全球化开端；三是封建统治达到高度集权的时代的开端。因此，在当今全球化和中国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加大研究明清史研究、尤其是明清丝路贸易史和对外开放史的力度，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二、研究回顾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郑和下西洋研究

2005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相关成果较为丰富：万明的《明代郑和的塑像——福建长乐显应宫出土彩塑再探》（《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3期）从明代衣冠制度的角度，配合文献分析，认为显应宫出土的巡海大臣像即郑和塑像。宋岷的《郑和航海与穆斯林文化》（《回族研究》2005年第3期）分析了郑和、马欢等远航领导层的穆斯林文化底蕴。杨怀中的《蕃客东来与郑和出使西洋》（《回族研究》2005年第2期）认为朱棣选择郑和领导下西洋是因为了解回族在航海方面的技术和经验优势，郑和亡于古里可信。万明的《郑和下西洋终止相关史实考辨》（《暨南学报》2005年第6期）对下西洋终止的原因、下西洋在经济上的贡献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在下西洋影响下亚洲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改变是郑和远航终止的客观原因，与明朝的海禁政策没有关系。张施娟、龚纓晏的《〈毛罗地图〉与郑和船队——评孟席斯的〈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3期）指出孟席斯所说的关键人物意大利商人康蒂并没有到过中国，有关男岛、女岛的记载实际来源于马可·波罗。郑一钧的《郑和全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李士厚的《郑和新传》（晨光出版社2005年版），吴海鹰的《郑和与回族伊斯兰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聂作平、李华的《夕阳下的舰队：郑和下西洋600周年评判》（巴蜀书社2005年版），刘登阁、李正鑫的《海殇：郑和航海六百年祭》（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以及万明校注的《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海洋出版社2012年版），李士厚的《影印原本郑和家谱校注》（晨光出版社2005年版），郑自海、郑宽涛编著的《咸阳世家宗谱》（晨光出版社2005年版），朱鉴秋主编的《百年郑和研究资料索引：1904—2003》（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等，则为进一步的郑和研究提供了方便。

2. 海禁和海外贸易方面

晁中辰的《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认为：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实行海禁，既不许私人船只出海，也不派官方船只出海贸易，外国商船亦不许来华，中外物

品交换被严格限制在规模甚小的朝贡贸易范围内。这实际上是对宋元以来海外贸易发展的阻碍。永乐年间海禁政策有所松动,并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私人海外贸易在暗中渐有发展。正德年间始行抽分制,使明廷在海外贸易中有了真正的税收。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重要转变。^①刘正刚、何横松的《海洋贸易与清代粤北经济的变化》(《学术研究》2010年第6期)认为粤北山区经济的商业化只是在过境贸易下出现的一种临时性的虚假繁荣。胡铁球《明清贸易领域中的“客店”、“歇家”、“牙家”等名异实同考》(《社会科学》2010年第9期)一文认为“歇家牙行”模式在贸易领域经营方式的内涵上名异而实同。

对外贸易方面,曹雯的《明治时期日本在华的调查状况和对华贸易的调整》(《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通过对几部中国纪行的整理、分析,揭示出19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日本在华贸易中由盲目出击到有序经营的转变。荆晓燕的《试论康熙时期的对日海外贸易政策》(《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2期)具体探讨了康熙时期对日较为积极的贸易政策。李金明的《广州十三行:清代封建外贸制度的牺牲品》(《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认为行商在实际的经营中,既得不到国家的支持,又没有法制上的保障,成为清代封建外贸制度的牺牲品。^②松浦章的《清代前期的浙江海关与海上贸易》(《史泉》85《史泉》,No. 60,1984年8月),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有关浙江海关的“黄册”资料,以数量分析为主,考察了在沿海贸易和海外贸易中占有重要位置的浙江海关的贸易情形。

汤开建、严忠明的《明中后期广州交易会始末考》(《学术研究》2005年第5期)对葡萄牙商人获准进入广州、广州交易会的开始时间提出了新的看法,并就葡商被迫退出广州后中国代理商的行为作了分析,认为广州是葡商在中国—印度—日本贸易链中的衔接点。颜广文的《晚明时期走私贸易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危害——以广州府为例》(《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分析了以官绅与奸商相勾结为特征的走私贸易,给广州地方社会发展带来的种种危害。李庆新的《明前期市舶宦官与朝贡贸易管理》(《学术研究》2005年第8

① 晁中辰:《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② 王士皓、李立民:《2010年清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3期。

期)指出永乐元年在广东、福建、浙江重设的市舶司一开始即由宦官提督,直到嘉靖时才有所改变,宦官提督朝贡贸易对宦官权力的扩大有重要影响。^①

夏秀瑞、孙玉琴的《中国对外贸易史》(第1册)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古代部分,主要阐述了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发生、发展、变化及其规律,重点介绍了从汉代至鸦片战争以前各个历史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管理制度等。^②

孙玉琴和赵崔莉合著的《中国对外开放史》(第1卷)一书,涵盖自两汉到鸦片战争前两千余年中国开放与封闭的历史。介绍了各个时期对外开放或封闭的社会经济基础;两汉—隋唐中国早期对外开放孔道的形成、发展、转移及绩效;宋元对外开放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勃兴;对外开放与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明清时期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逆转,“闭关锁国”政策形成、演变及其宏观经济效应。^③

3. 海关史研究

学术界海关史研究成果有:厦门大学陈诗启教授是近代海关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他对外国使官管理前后的中国海关作过详尽的论述,著有《中国近代海关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该著作较系统地考察了中国近代海关与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变化的关系及其这种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福建师范大学黄国盛教授著有《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关》一书,此书第一次以全面的历史视野考察了海关这一重要机构在东南沿海四省从设立之初到日渐成熟的整个过程,系统地研究了四省海关的组织机构以及运作特点,打破了以往学者仅仅将研究目光集中在某一零散的海域或个别口岸的局限。厦门大学林仁川教授著有《福建对外贸易与海关史》(鹭江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从对外贸易的角度来论述福建海关的演化过程,不同时期的作用与特点,重点阐述了海关与福建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他认为福建海关的设立客观上促进了福建经济的发展,由于外贸的需要,在福建的腹地与沿海形成了一个以内地初级市场到沿海中心市场组成的出口系统,使沿海地区与山区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

① 张金奎:《2005年明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5期。

② 夏秀瑞、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史》(第1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③ 孙玉琴、赵崔莉:《中国对外开放史》(第一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4. 对外贸易政策和制度方面

万明的《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故宫出版社 2014 年版）对于中国古代与海外的关系进行了全面回顾，集中在明与清前期的海外政策静态与动态的阐述与比较上。修订本将原版六章扩展到七章，其中一些章节增加的内容为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和思考。

李庆新的《明代海外贸易制度》，以翔实的资料，比较完整地论述了明代海外贸易体制及其从传统制度向现代制度转型的某种趋势，对明代海外贸易史提出诸多原创性见解，成为富有学术价值的基础性专著。主要观点如：明代海外贸易从传统的市舶司贸易向近代的海关贸易转化，实质是从朝贡贸易到商舶贸易的“变态”。明代海外贸易附属于政治的性质特别鲜明，或者说政治色彩非常强烈。^①

5. 朝贡贸易

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所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一书以中国传统的朝贡贸易体系为基点，运用国际经济圈的理论分析论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近代亚洲经济圈的状况，兼及亚洲经济圈与西欧、美国经济圈的关系，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并对以往的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化中所采用的“西方冲击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从中国和亚洲内部的传统因素中寻找中国和亚洲近代化的前提条件及其影响，从而较好地处理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②

李云泉的《明清朝贡制度研究》（暨南大学 2003 年博士学位论文）指出：明清时期，朝贡制度臻于完善，并以此为手段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华夷秩序”。具体探讨如何把握其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探讨其内部结构、运行机制和特征，对于拓展中外关系史的研究领域，揭示古代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不无理论和现实意义。

以上是相关的几个突出问题的研究介绍，可见，有关对外开放史的研究比较有限。

① 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

② [日] 滨下武志著，朱荫贵、欧阳菲译：《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三、理论依据和主要内容

在理论上,马克思的一系列理论和论述,构成了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的主要理论依据。研究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策略,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分工理论、国际价值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分析中国对外贸易的理论依据,进而从基础和根本上分析中国对外贸易策略。

马克思创立了国际分工理论、国际价值理论以及社会再生产理论,这些理论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对外贸易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成为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的理论依据,分析和研究中国贸易发展策略,应从马克思的这些理论和论证入手。

(一) 国际分工理论: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的指路明灯

马克思主义国际分工理论指出,国际分工是客观的经济范畴,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国际分工不是抽象的,它的形成和发展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因而必然带有强制、畸形、剥削和掠夺的性质和特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分工、互为市场的贸易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控制与被控制、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平等关系。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分工理论科学地论证了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与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且还揭示了国际分工的性质,是中国对外贸易的理论基础,更是中国对外贸易健康发展的指路明灯。中国作为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积极参与和利用国际分工,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在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中一方面存在着相互需要、相互依存、促进双方经济发展的互惠内容;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控制与反控制、剥削与反剥削的矛盾内容。

(二) 国际价值理论:中国对外贸易理论创新的指针

马克思在其国际价值理论中指出,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经济规律,只要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必然存在价值规律的作用。商品的价值不取决于生产者的主观愿望,更不取决于商品生产者的个别劳动时间,而是取